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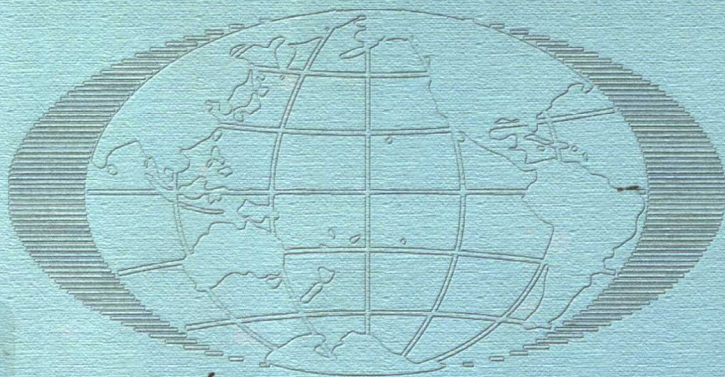


Academic Series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外交学院学术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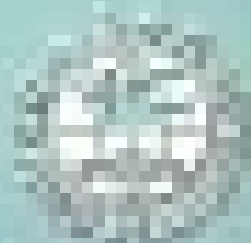
# 文化与国际社会：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理论研究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

● 秦亚青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Academic Series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Library

# 文化与国际社会：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理论研究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

■ 曹长盛 主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文化与国际社会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秦亚青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秦亚青  
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2

(外交学院学术丛书)

ISBN 7 - 5012 - 2998 - 8

I. 文... II. 秦... III.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IV. 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4877 号

**责任编辑**  
**文字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袁路明  
许丽娜  
赵 玥  
戴文达  
徐威明

**书 名**

**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Wenhua Yu Guoji Shehui; Jianguozhuyi Guoji Guanxi lilunyanjiu

**作 者**

秦亚青 主编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印 刷**  
**经 销**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印 数**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www.wap1394.com](http://www.wap1394.com)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  
787 × 1092 1/16 15½ 印张  
260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200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1—3500 册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序

外交学院是一所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中国国际法学会这两大全国性的学会均挂靠在外交学院，为我院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学术上的支撑。《外交学院学术丛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

首先，丛书的出版适应了中国的外交学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进入黄金时期的需要。

外交与国际关系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特别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际形势大变化，中国国内形势大变化，中国外交大发展，国内国外大互动。这种形势推动中国的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所谓“黄金时期”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需求大。对于外交学、国际关系等的研究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之旺盛。世界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中国和世界的变化相互影响，这在国际关系中提出了很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中国正在崛起，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中国面临着许多的机遇，也面临大量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需要我们这些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提出一些好的点子。中国发生的事情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的崛起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如果说过去世人对中国的看法不是很重视的话，今天则不然，几乎所有的问题，世人都想了解中国的意见和立场。如何让世界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这就需要了解中、外双方，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应当能够对此作出贡献。

“黄金时期”的第二层含义是热情高。中国研究外交学、国际关系等的学者，看到了这样一个旺盛的需求，他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愿意

为满足上述需要贡献自己的才智。

“黄金时期”的第三层含义是影响深。影响深是指在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形势下，中国研究外交学、国际关系的学者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研究的成果是国家所需要的，是人民所需要的，也是世界所需要的。

第二，丛书的出版适应了外交一线的需要。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进入了一个自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活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国无论是在外交理论方面还是在外交实践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形势要求我们对于这些理论与实践创新进行很好的总结。中国的外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忙碌，外交一线的同志每天都有大量的事要处理，很少有时间对我们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进行很好的总结；而我们在外交学院进行教学和研究的这些同志则不同，我们能够坐下来对我们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进行很好的思考和总结。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入发展，中国外交也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处理好这些课题需要好点子，需要一些长远的思考和眼光。此外，国际上也出现了许多有关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新的概念和理论，都会对国际关系的走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需要我们进行观察和研究。

第三，丛书的出版也是外交学院发展的需要。大学的生命线是教学。外交学院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建新校园，师生的数量都要增加，这一切都需要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教学质量的提高需要学术研究来支撑，研究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

综上所述，《外交学院学术丛书》的出版是恰逢其时。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李嘉诚先生对外交学院学术研究的大力资助；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对我们的一贯支持；同时，我还要向为丛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学院的老师们表示敬意。

《外交学院学术丛书》反映了本院老师和研究工作者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都是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通过对形势的观察，对问题的研究，进行独立思考所提出来的，都属于个人的看法和见解，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指正。

吴建民

2006年10月于北京

## 前言 世界政治的社会建构

### 一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当时，冷战已近结束，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辩论的强劲势头已经过去，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之间的论争也达到了难以出新的地步。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虽然自由主义的复兴和两大学派的竞争带动了国际关系学术界的进步，产生了许多对这两大流派理论进行经验性验证的学术著述，但新的思想却不多见，研究议程越来越集中，观点交锋越来越缓钝。而在国际关系的真实世界里，东欧剧变和冷战结束，无疑使得人们反思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解释能力。所以说，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也就似乎是正逢其时了。

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介绍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其后，发展势头强劲。出现了一批译著、专著和论文。但是，我们也发现，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上面。一方面，这大概是因为温特建构主义在西方也是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话和交锋最频繁的理论。以美国为例，建构主义的主要实证著述大多是在以温特为代表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因为温特建构主义比较容易产生具体的研究纲领和理论假设。像卡赞斯坦、芬尼莫尔等都属于这个行列。另一方面，其他建构主义理论，尤其是偏向语言学和后现代的建构主义理论，往往难以产生可以操作的研究议程和难以进行实证性验证。虽然这些理论的分析十分深刻，学术价值也很高，但比较偏向后现代理论，可操作性较低，应用性较弱，所以，人们的关注度就比较低。在西方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本书的目的是为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主流建构主义图谱。所以，我们分析了奥努弗、克拉托赫维尔、温特、鲁杰、卡赞斯坦和江忆恩。所谓主流，是指承认社会理论可以解释社会事实和理解社会意义的理论，是以“立”为主的理论。<sup>①</sup>他们提出和发展了这些理论，目的是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国际关系的世界，理解世界政治的意义。如果使用鲁杰的分类方法，主要包括新古典建构主义和自然建构主义。<sup>②</sup>同时，对于这些理论，不少国际关系的研究人员，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并没有基本的、系统的了解。比如奥努弗，他是第一个将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他的著作《我们建构的世界》也是建构主义的重要著作。他的规则建构主义是从语言学角度了解世界政治的重要途径。再如克拉托赫维尔，他的规范建构主义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对于国际社会的建构与运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但是，这些学者的理论在我国国际关系学界仍然是相当陌生的。

所以，我们想认真介绍和评析这些在广义上可以称为主流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使读者对主流建构主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没有收入批判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理论。其实，批判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主流建构主义也在许多重要方面借鉴了批判理论和后现代建构主义的思想。像阿什利、德里安等人的论述，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sup>③</sup>如果没有他们的理论，建构主义的图谱仍然不能说是完整的。所以，本书不是全面地评介建构

---

① 对于什么是“主流”建构主义，可能会有许多不同观点。这里只设定一个标准，就是承认社会理论具有基本的物质基础，具有说明和理解作用，并试图建立这样的理论。这就将批判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排除在外，因为前者的目的不是说明和理解社会世界，而是要改造社会世界；后者则不承认一个基本的物质基础，认为一切全是人的建构。

② 鲁杰将建构主义分为三类：新古典建构主义（neo-classical constructivism）；自然建构主义（naturalistic constructivism）；后现代建构主义（post-modernist constructivism）。第一类包括奥努弗、克拉托赫维尔、鲁杰、卡赞斯坦、芬尼莫尔等；第二类包括温特、德斯勒。江忆恩等也应包含在这一类。第三类有阿什利、德里安、沃克等。主流建构主义包含第一类和第二类。参见约翰·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载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主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285页。

③ Richard Ashley,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1984, pp. 225–286; “Untying the Sovereign State,” *Millennium*, Vol. 17, 1987, pp. 227–262; James Der Derian, “A Reinterpretation of Realism; Genealogy, Semiology, Dromology,”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 ed. James Der Deria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63–396.



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我们的目的是描绘一幅比较完整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图谱。

## 二

首先，我们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建构主义的思想渊源。虽然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兴起，但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念，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的。像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一样，这些思想大多来自其他重要的社会科学学科。<sup>①</sup>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学、语言哲学和国际关系学本身。

### 1. 社会学

社会学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可能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重要的。如果说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学吸取营养，那么，建构主义则主要是从社会学得到启迪。一般来说，社会学是研究人的社会性活动的科学，包括社会互动、人群生活、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等。<sup>②</sup>如果我们将世界视为一个社会，那么，社会学的概念、范畴和研究内容就与国际关系高度相关。简单地说，社会学思想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 (1) 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差异

鲁杰认为，建构主义的思想渊源在于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sup>③</sup>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世界是否等同于自然世界？社会科学是否等同于自然科学？这是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一元论，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属科学，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一致的。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以发现规律为目的。所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根本上

<sup>①</sup> 比如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借鉴微观经济学，杰维斯的国际政治心理学借鉴社会心理学等。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

<sup>②</sup> 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 页。

<sup>③</sup> 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第 257 - 263 页。

说没有区别；第二种是二元论，认为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其根本不同就在于社会世界研究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既然是人做研究，就不可能完全价值无涉。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自然界的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社会世界的规律和理解社会世界的意义。<sup>①</sup>后一种目的是自然科学所没有的。

虽然涂尔干比较偏向一元论，但他对观念的重视却使他的社会科学观点与纯粹的自然科学派不尽相同。他认为观念因素有着自我的完整性，不能被化约为其他因素，社会世界的核心概念是观念。并且，他将社会事实定义为人通过实践活动的社会性建构，强调了社会规则的重要作用，这些都反映了他重视社会因素的基本思想。<sup>②</sup>同时，他又试图将道德观念和其他社会性因素引入研究设计而不破坏科学的客观性。既注重观念和社会事实的人为建构，又试图保持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涂尔干的这种思想对后来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尤其是温特等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建构主义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韦伯更倾向于二元论，认为社会科学可以独立成为体系。人具有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特殊能力，这是自然界所没有的。“意义”成为韦伯理论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我们是文化动物，我们有着对世界采取某种特定态度和赋予世界以意义的能力和意愿”。<sup>③</sup>在对社会世界的研究之中，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人的行动的社会意义，而意义是观念范畴的内容。自然科学以客观的物质存在为本体，以发现客观世界的规律为目的，以“说明(explanation)”为基本的认知方法。社会科学却没有这样清晰。社会科学包含了无法回避的主观存在，发现规律和理解意义都是社会科学的目的，其方法不仅仅是“说明”，而且还必需要“理解(understanding)。并且，在很多时候，理解是社会科学的主要方式，诠释(interpretation)也是重要的理解形式，因为社会事实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sup>④</sup>无论是理解还是诠释，都加入了人的主观能动，而非单纯地发现和解释客观现象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大多数建构主义学者都接受了韦伯的这些思想。

① 顾忠华：《韦伯学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50页。

② 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第258-259页。

③ 同②，第256页。

④ 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另参见 Hayward A. Alker, *Rediscoveries and Reformulations: Humanistic Methodolog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因此，对于建构主义来说，理解社会世界的意义就成为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建构主义学者常常使用温特所举的例子：对于美国来说，英国拥有核武器并不构成威胁，但朝鲜拥有核武器就是极大的威胁。原因很简单，虽然核武器作为物质的本身没有区别，但美国和英国是朋友，英国核武器的意义会在康德文化的表象体系中产生；而美国和朝鲜是敌人，朝鲜核武器的意义则会在霍布斯文化的表象体系中产生。

## (2) 社会结构与施动者的关系

建构主义进入国际关系领域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结构与施动者的关系问题。1987年，在奥努弗的著作问世之前，建构主义一词虽然还没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术语，但温特发表了颇具影响的论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结构——施动者问题”，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施动者与结构互构）引入了学理辩论的行列。1989年德斯勒的论文“施动者——结构论战的实质意义”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对建构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比如，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在温特的分类图谱里面，他把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置于个体主义范畴，但画上了一條趋向整体主义的箭头线和一个问号，表明结构现实主义有着整体主义的趋向和部分整体主义的内涵。<sup>①</sup>但是从根本上说，华尔兹理论是个体主义的，因为它假定个体单位是先于整体结构的：体系单位的互动形成了体系结构。之后，体系结构才有了自在的身份。反之，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则恰恰相反，它假定体系的先在性，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定义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sup>②</sup>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学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sup>③</sup>他批评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单元的二元论（dualism）观点，并试图以二元性（duality）克服二元论，即社会结构和施动者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因素，不是互为“外在”，因而在本体上也没有先后之分。结构是一种资源和制度的组合，结构和施动者之间是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结

①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② 哈里·古尔德：《行为体——结构论战的实质意义》，载温都尔卡·库芭科娃等主编：《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肖锋译，张志洲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119页。

③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猛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构既是施动者实践活动的结果，也是这类活动的中介和转换体系；既使得施动者的行动成为可能，又制约着施动者的行动。同时，施动者的行动又不断地产生了新的结构。<sup>①</sup> 吉登斯的二元性概念是他的理论的核心，结构与施动者互构又是二元性理论的核心。二元性实际上是表述了一种结构和施动者互相建构的关系，而不是理性主义理论所探求的因果关系。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迪，提出了结构和施动者互构的观点，以反驳结构和行为体相互独立的理性主义观点。

### (3) 社会互动过程的意义

米德、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是建构主义借鉴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其核心是自我和他者的有意义互动（或曰“符号互动”）造就了自我的身份和利益。所谓“符号互动”，就是有意识、有意图、有意义的互动。比如，一个人下意识地挥挥手，只能称为“非符号”行动，因为其中不具任何有意图的内涵。但如果他意识到别人向他一拳挥来，然后挥手抵挡他人的进攻，这样的挥手，则成为有意图和意义的“符号互动”。米德在讨论人的心灵的时候，区别了人与动物的不同。动物只有本能的冲动，而人却有着反思性的理智。所以，人组成的社会与自然界有着本质的不同。

自我和他人是社会互动的基本内容，社会则是人创造的和使用的符号的总和。社会存在，既不是唯心主义所认为的主观臆造，也不是物质主义所认为的物质事实。社会存在是实在的，但又是可变的，是由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地创造出来，由各种符号互动表现出来的。<sup>②</sup> 自我的身份和利益是在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建构、产生意义并逐步发展起来的。温特认为，对建构主义感兴趣的身份和利益形成问题，符号互动论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而理性主义者虽然也关心互动，比如博弈论也是分析互动的，但却只注重利益层面的权衡和战略性行动选择，无视互动对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sup>③</sup>

所以，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为从社会角度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可能，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供了结构和施动者互构的理论，米德、布鲁默的符号互动理论说明了自我和他者通过符号互动过程产生和造就

① 哈里·古尔德：《行为体—结构论战的实质意义》，第113页。

② 侯均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

③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13—214页。

有意义的身份和利益。这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着直接的影响，对温特、德斯勒等人的结构建构主义来说，尤其如此。<sup>①</sup>

## 2. 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另外一个主要思想源泉。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吉登斯的社会学的结构化理论和米德、布鲁默的符号互动理论等虽然为建构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但正如塞尔所说的那样，这些理论缺乏“关于言语行为、述行、意象、集体意象或是规则指导下的行动等方面的成熟理论……”。<sup>②</sup>而语言本身就具有建构社会事实的功能，包含构成性的规则，所以，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之后，语言哲学就直接影响到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如果说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接近反思主义、与后现代理论有相似之处的话，深层的原因是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在这方面为这些理论提供了共同的本体论基础。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影响最大的可能是言语行动理论，其中，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丁和塞尔等语言哲学家留下的痕迹尤为明显。

### (1) 语言的本体地位

西方哲学在 20 世纪初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语言的本体地位与传统语言学出现了重大的差异。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哲学重视认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语言的逻辑特征和工具功能。由于语言被定义为描述实在和表达思想的工具，研究的内容也就是语言是如何再现已有的存在，语言本身在描述的时候具有多大的逻辑上的精确性和描述上的真实性。比如，罗素强调语言的严密逻辑结构，认为数学语言是最完美的语言，因为它最严谨地表达了理性的思维。早期维特根斯坦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图像论，认为一个描述事物的句子一定是一个现实的图像，亦即语言是表现现实的，语言结构等同于世界的结构。在这种将语言视作叙述和表述工具的框架中，语言被视为后在于事实和思想的东西，或者说，事实和思想都是先于语言存在的。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标志着从重视语言的逻辑性和工具性转向了重视

---

<sup>①</sup>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 - 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1987, pp. 335 - 370; David Dessler, "What's at the Stake in the Agent - Structure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3, 1989, pp. 441 - 473.

<sup>②</sup> 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 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第 262—263 页。

对于语言“意义”的研究。索绪尔质疑了语言和客观世界之间具有自然指涉关系的观点，认为能指和所指是有实质差异的。<sup>①</sup> 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著名论断提升了语言的本体地位。<sup>②</sup> 于是，在后来的语言学研究中，语言逐渐被视为具有创造力量的因素：不仅仅是表达思想和描述事实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建构社会事实，建构思想，甚至建构人的身份。比如，塞尔将有些事实定义为“制度性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也就是在人们共识的基础上建构的社会事实。他强调语言在社会事实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认为语言对于社会事实具有先在性，亦即是先于社会事实存在的。<sup>③</sup> 语言属于制度范畴。语言建构社会事实，也就是制度建构社会事实。<sup>④</sup> 制度建构社会事实的论断对后来的建构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不仅在奥努弗和克拉托赫维尔那里，而且也在温特、芬尼莫尔等诸多建构主义学者的理论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 （2）语言的实践意义

后期维特根斯坦从日常语言开始，从语言的使用开始，质疑为一个词语找到一个对应的实体的观点。他将语言使用视为一种游戏。既然是游戏，离开了两种因素，语言就毫无意义。这两种因素是：游戏参与者与游戏规则。离开了游戏参与者，就不存在有意义的语言，比如对一个不懂中国象棋的人说“马走斜，象走方”是没有意义的。离开了规则，也就没有了游戏。在不同的规则中，同样的语言可以产生不同的意义。对于语言来说，规则就是语法；对于社会来说，社会规则具有同样的功能。可以看出，后期维特根斯坦将语言视为行动（游戏），强调语言的意义在使用中产生，这样便将语言的意义、语言参与者、语言的规则这三者密切联系在一起。离开了任何一方，另外一方都不可能存在，自然

① 韩震、董立河：《论西方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载《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50页。

② 朴金波：《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载《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83—86页。

③ John Searl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Fact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pp. 59-60.

④ 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塞尔认为语言可以建构社会事实，亦即制度性事实。因为：1) 任何社会事实都首先需要语言（哪怕是最原始的语言），然后才会确立诸如货币、婚姻等社会事实；2) 任何社会事实中都含有语言的成分。这就确立了语言在本体上先于社会存在的地位；参见 *Ibid.*, p. 60.

也都不会具有意义。<sup>①</sup>

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丁更加重视语言的实践意义。在他的言语行动理论中，言语是作为交际过程中的话语存在的，认为“言语即行事”。<sup>②</sup>他曾经将话语分为“行为式说话方式”和“记叙性说话方式”两大类，指出记叙性说话方式有真假之分，而行为式说话方式则只有得体与不得体之分，没有真假之分。这就出现了真实性和恰当性的两种不同的标准。进而，如果说话的方式属于第一类，则必然与说话者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奥斯丁将交际过程中的行为分为三类：以言指事、以言行事、以言取效。对于他来说，任何言语都是行为。指事属于记叙行为，行事是指言语超出了单纯的言语记叙，本身就是在做事情，就是采取某种行动。而以言取效则是指听话者在听到某种话语之后采取的行动回应。在这样一个实践过程中，言语不仅是主体的单方行动，也不仅仅是主体对客体的行动，这是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行动；言语的意义也不仅仅是表达某种思想或是作为交流的工具，而是本身就包含着内容、自身就具有意义的行动。由于这是一个交际过程的行动，行动的环境就成为重要的因素，因此，语境在奥斯丁那里也就成为一个核心概念。言语的意义和效果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之中才能够发生。在语境之中，恰当性和真实性标准也就共同存在。<sup>③</sup>

### (3) 语言的人文特性

自笛卡尔以来，近代西方的传统哲学是以理性为核心的。具有严格逻辑规则的语言和科学的语言成为标准的语言，理性主义的语言也成为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主导语言。人们将美与真分

① 比较温特关于身份建构的例子：奴隶、奴隶主和奴隶制三者之间是相互建构的，缺少任何一项，另外两项便不存在。也就是说，建构主义不预设任何一项的先在性，亦即本体上的优先性。参见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02—107页，第281—292页。

② 奥斯丁的主要著作《如何以词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参见王健平：《语言哲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21页。

③ 实际上，建构主义多是考虑适当性的问题，亦即行为的得体与否，而新现实主义等主流理论则强调真假问题，亦即行为体的行为是否可能发生、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发生等。鲁杰提出的两种不同规则也与之相关：构成性规则更侧重于恰当性原则（什么身份做什么事情），而限制性规则更侧重真实性原则（在条件X下出现行为Y是更真实的事情）。参见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但在奥努弗那里，这两种规则被结合在一起，成为相互不可分离的，所以，适当性与真实性也就是相互关联的。参见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51。

离开来，因而也就将艺术与哲学分离开来，同时，也将哲学与科学更为密切地结合起来。这一分一合奠定了哲学上的理性统治，理性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奉为神圣。逻各斯的希腊文原意是谈话，而在哲学中则用来说明理性和规律。理性的绝对化以及理性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就，使理性的话语主导地位日益巩固。理性被“当做一种普遍有效的尺度和万能的工具，似乎一切都可以而且应当由理性来建立，一切都可以而且应当以理性来判决，任何科学都由理性概念构成，都以是否符合理性的要求为真伪标准，任何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也都应由理性来认识和解决。社会秩序应该是理性秩序，理想的社会只能是理性社会，而一切思想和文化体系也同样应当是理性体系”。<sup>①</sup>从哲学角度来看，理性主义的重要假定是主客、心物、思有之间的二元分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理性的主宰标志着人的部分失能。

当西方哲学从近代走向现代的时候，人们开始质疑理性主义传统，试图克服二元分立思维，人文精神开始复兴。人的本真存在、活动意义成为哲学的核心。同时，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也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主体间性代替了单纯的主体性，主客互动代替了主客分立。<sup>②</sup>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正是这种整体思维转向的一个重要表现。

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理性的主宰也就失去了往日的风范。语言更多地被认为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意义，语言本身的逻辑性和理性不再具有认识论阶段的超然性和绝对性，语言的意义只有在人的使用之中才能产生。所以，语言学转向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可将独立于人存在的纯逻辑语言转向只有在人的使用之中才有生命的实践性语言；将人和语言可以分立的假定转向人与语言的互动和互构。这样，语言的意义更多地成为一个社会性概念，因为它是主体间理解产生的，是在人群的互动实践中形成的。

建构主义者意识到这个问题，便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规则与规范等重要社会概念，像奥努弗、克拉托赫维尔等就深受语言学的影响。以奥努弗为例，他的建构主义理论可以称之为规则建构主义，其中，规则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而规则正是来自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通过言语的方式促使其他人采取相应行为的做法。如果相同效果的言语

① 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② 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第17-18页。



行为频繁重复，人们的行为就会形成惯例。如果惯例使得施动者认为他们应当依此行事，那么，惯例就成为规则。规则与施动者通过言语行为进行互构，规则制约行为，建构身份、形成统治。<sup>①</sup>

### 3. 国际关系理论

建构主义也直接从国际关系理论中吸取了营养，其主要的理论借鉴是英国学派、新功能主义和交流沟通理论。

#### (1) 英国学派

英国学派的核心理论是国际社会。温特在为国际关系理论分类的时候，指出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将国际体系作为由共同规范管理的社会，认为邓恩将英国学派视为现代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先驱的观点是令人信服的。<sup>②</sup> 这是因为英国学派的三个重要内容为后来的建构主义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源泉。第一，英国学派将国家组成的体系不仅仅视为国际体系，而且也视为国际社会。建构主义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的，其重要理论来源是社会学理论思想，所以，建构主义的重要预设也正是英国学派的理论核心——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以社会的形式呈显出来，才可能以社会学的方式加以研究。因此，英国学派和现代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英国学派对建构主义的影响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社会这一根本的国际政治概念。

第二，在本体论上，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也有相似的地方。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概念继承了格劳秀思传统，其理论在本体论上也属于重视理念作用的弱式物质主义。英国学派早期重要学者查尔斯·曼宁认为，国际社会不是一种经验存在，而主要是一种观念的实体。<sup>③</sup> 因为它虽然强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基本单位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强调国际法、国际规范和制度对国家的制约作用。邓恩在总结英国学派的时候说，国际社会的一些主要规则和制度，比如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等，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在不断的实践互动中建构起来的。<sup>④</sup> 另外，在方法论上，英国学派赞

<sup>①</sup> 尼古拉斯·奥努弗：《建构主义：应用指南》，载温都尔卡·库芭科娃等主编：《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肖锋译，张志洲校），第75-82页。

<sup>②</sup>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页。

<sup>③</sup> 方长平：《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一种比较分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编：《国际前沿问题研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3页。

<sup>④</sup>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187.